

我们时代的难题

〔英〕拉斯基 著

朱曾汶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时代的难题/(英)拉斯基著;朱曾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书名原文: The Dilemma of Our Times

ISBN 7-100-03052-8

I. 我… II. ①拉…②朱… III. 苏联-对外关系-西方国家-现代 IV. D83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75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WŌ MEN SHÍ DÀI DE NÁN TÍ

我们时代的难题

[英] 拉斯基 著

朱曾汶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052-8/D · 269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1/4

定价: 15.00 元

序 言



罗德·拉斯基于1943年撰写并于1944年出版了他称为的“历史分析论文”，书名叫做《信仰、理智和文明》(Faith, Reason and Civilization)^①。这个日期是重要的。

它写成于他的各种战时活动——政府的、党的和教授的——繁重任务之中，而写的目的，我们觉得，主要是为了澄清自己对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首先是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争所产生的，其次是他对之深信不疑的胜利所产生的。在那一年中，许多人觉得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似乎真正弥合了，其实这个裂口始终存在着，它尽管在大多数国家联合反对希特勒的全盛时期证明能够缩小，却被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下子扩大到简直无以复加的地步，布尔什维克革命就凭这个条约，在它的全体朋友和它的不少敌人惊恐失色的情况下，站在放肆和野蛮的侵略以及统治自由世界的图谋一边，并且通过不可饶恕的重新瓜分波兰，以传统方式完成了这笔买卖。

两个暗害波兰的国家最终一定会翻脸，这一点哪怕对于最愚钝然而正直的政治研究者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了拯救在1940年和1941年初从未完全摆脱这种忧虑的自由世界，会不会很快翻脸，依然是个令人苦恼的猜测问题；现在由外交界最近透

^① 伦敦书店出版。

2 我们时代的难题

露的情况证明,这种忧虑也许就是不得不同红军在战场上遭遇。希特勒在1941年突然进攻俄国,至少在战争时期内真正消除了那种忧虑,但西方国家同俄国的未来关系却始终是个谜,因为持久和有益的和平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持久联盟,但由于结盟国家所抱的目的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这些不同公开地或秘密地在每个国家内部起着积极作用,所以这种持久联盟又取决于内部的改革和心理的调整,所有这一切,即使政治野心能够调节,政治顾虑能够消除,也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的。

拉斯基和其他一些以俄国和俄国革命的朋友——尽管是爱挑剔的朋友——自居的人,一同体验了战前时期(那时反纳粹力量的联盟似乎是和平的唯一保证)的强烈感情,当斯大林先生丢弃了那种联盟,与公认的共同敌人缔结紧密同盟时,又深深感到失望。但是,到了1943年,所有的人都极其兴奋,这一来是因为拥有俄国作为西方国家的同盟,二来是因为至少已获得许多迹象,说明这种同盟能被解释为促使俄国离开帝国主义而向民主自由前进的动力。

在那种气氛下,过去的许多事情必须丢弃,新的形势必须加以分析,作为向所谓的“当代革命”前进的起点。论文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背景,从中既查明这样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也弄清那些希望在一个新的和团结的自由世界中和解的人应当采取的路线。很明显,从物质观点看,胜利会使俄国和美国成为两个无比强大的国家;它们同样也能够政治上和精神上发挥最巨大的影响,正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使得已被从最重要的地位上撵下来的旧世界惶恐不安。拉斯基对这两个国家都非常喜爱。在俄国,他看到一种过程在起作用,这种过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并随之而创造了新的价值观;在美国,他看到一个仍旧像生成阶段的俄国那样的国

家,它确实还没有像俄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同过去的历史决裂,但是能够实现同样的创造。从这两个国家的和解中,拉斯基立即看到了希望和未来的危险,但是毫不轻视那些挡在两国以及其他一切国家道路上的历史性障碍,这些国家由于自身软弱,必然会被这个或那个国家拉拢过去。

问题是:世界会不会服从美苏两国的联合领导,或者,如果美苏不再联合,世界将会服从哪个国家的领导,在美苏不再联合的情况下,一方蓄意骚扰另一方的意向就会逐渐显示出来。因此,拉斯基就撰文来仔细探究当代的道德、精神和政治危机。文章写得极其仓促,就同那些在他有限的“闲暇时间”里充塞他头脑的思想一样突如其来。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时候,要做到决定性是不可能的。它与其说是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分析和说明问题。它并不预言未来,那时未来首先正在战场上决定。它主要想指出不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法去解决正确的问题将会对未来产生的后果。它包含着对人和政策的强烈甚至猛烈的批评,因为只有批评才能够就某些被默认的发展情况所包含的危险向读者提出警告,这种警告和往常一样,主要是针对年轻读者提出的,因为他们认为实际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已使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危机,不必急于加以解决了。

本书强调的是当时的情况,拉斯基必然想把它加以修改和补充,使它更好地适应接踵而来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胜利非但没有减轻危机,反而使危机加深,形势的发展开始使乐观者失望,悲观者坚定。拉斯基认为他在1943年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仍然有价值,但需要照俗话所说使它“合乎时代”;即使乐观者开始畏缩,也决不可把地盘让给悲观者。因此,他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

4 我们时代的难题

月动手写增补的一章了。

这几个月甚至比战时还要忙碌,战时操劳过度影响了他的健康,战后国内外的事件也没有使他放松。他和平时一样写作时思潮如洪流奔腾,结果增补的一章简直扩大成了一本新的著作,字数和原来只打算对之作补充的书差不多。原先的论点有不少被重复提出,尽管往往更加充实,而且形式总是有所不同,然而根据以“冷战”为主要特征的最新事态发展作了增减;有不少论点是崭新的,其中有些与其说是补充原来的论点,不如说是与原来的论点相矛盾的。他究竟会不会放弃增补的念头而最终写成一本包罗万象的新书,或者会不会将两者加以删节,合并成一本新书,我们都不得而知。这部手稿是未完成的,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它接近完成;就留下的部分看,议论决没有抒发完毕。他的遗著保管人这样就碰到了一个难题:决定把它出版还是不出版。有两点是很明显的,第一,按照它遗留下来的样子,难以把它当作补充的一章附在1943年的著作后面再行出版,第二,没有第二个人能抱有写他原定要写的那本书的希望,试图把它写完。办法只有两个:要么不把手稿发表,让1943年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落空,要么把它按照不完全的样子,作为他的最后的未完成稿发表,预先告诉他分布在许多国家里的读者和研究者,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没有经过作者订正,相信他们会宁愿把即使是目前这样的书当作一件最后的礼物,而不是根本不要它。拉斯基夫人完全同意后一种看法,因此它现在就出版了。

本书编者——如果他有资格这样自称——的工作严格规定在他认为是拉斯基本人会规定的范围之内。原文未作任何更动,只是改正了一些作为草稿在所难免的事实上或语法上的明显疏漏,

由于对早期作品的同样方式的工作曾博得拉斯基的赞许,因此相信现在所做的工作同样也会获得赞许。无论在风格方面或者见解方面,编者都没有作丝毫更动,哪怕有些地方拉斯基本人显然会加以修改,因为在研究过一些新的著作以及“冷战”在朝鲜演变为真刀真枪的“热战”——这种演变是他担心的,但满怀信心地希望能够避免——之后,他必然会被迫作出与以前对形势作出的论断有所不同的论断,这种形势由于变化迅速,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加强了他的看法,在另一些情况下也使他的看法“过时”。一件本身就是订正的东西,如果不经他本人最后的订正,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最后的政治遗嘱。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人的遗言,这个人在 30 多年内就文明社会通过同意或不同意的改革而生存下去这一主题所讲的话受到了倾听,听众的范围远比一个大学教授通常有的范围来得广泛。因此,有理由可以相信本书会受到欢迎。

这里肯定不是作评价或写传记的地方。已经有那么多的人作出了评价,编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以补充,而拉斯基的传记目前正由能干和友好的金斯莱·马丁先生在写,编者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但如果借这个可以说与他在职业上告别的机会,让一个在政治上难得和他意见相同,在其他一切方面确也难得意见相同,但却一贯受到他的几乎使人不安的关怀的人说句私房话,这似乎是可以原谅的。他实实在在是我生平所遇到过的天性最仁爱的人。

R. T. 克拉克

1951 年

第 1 章



战争以胜利告终后的年代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和平；相反，倒不如说，这些年代使我们知道，那条把我们同实现和平分隔开来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和艰难。因为，不仅过去在反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欧洲战争中的伙伴们而今分裂为两大阵营，就像两个角斗士摆好架势，战斗一触即发；不仅没有就德国或日本的未来达成重要的协议，而且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滚滚巨浪正从马来亚到中国和东南亚席卷世界；在非洲，无论阿拉伯人还是黑人都发生大规模的骚动，他们以许多难题威胁着那个大陆上的白人移民，这些难题的深度与他们先前碰到过的任何一个难题大不相同。目前还几乎没有丝毫征兆表明我们已经获得政治或经济或社会的平衡，这种平衡使人们感到轻松和安全，并由此而获得自信，也相信邻人的善意。在飞机可以把原子弹载送到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地方的时代里，近邻已开始大大失去其意义，善意则除非有一种能在一夜之间动员起来的潜在的武力作后盾，就是一种空洞的姿态，这种情况确实是怀疑和恐惧的主要根源之一。

使我们的问题分外复杂的，是以美国为一方和以苏俄为另一方的压倒一切的力量。世界上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生产力集中在单独一个政府手里，就像美国政府今天所控制的那样；美国的技术水平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敌手。苏俄人

8 我们时代的难题

力较多,生产资源也可能较多,这些资源开发出来以后,将与美国的生产资源匹敌,说不定还会超过美国。话虽如此,下面这种说法却并非过分,那就是:尽管自1917年以来,俄国有了巨大的发展,生产技术中却有一个重要因素使得莫斯科政府甚至休想赶上目前的美国标准;此外也没有天生的理由可以认为,一个世代以后,差别将至少不会像目前那样悬殊。这是因为,苏俄不但必须完成使它的各族人民适应于生活的节奏和机器所需要的纪律这一心理过程,而且还必须在一个被战争破坏惨重的广阔地区内这样去做,而美国却不但始终没有受到过损失,反而还能够大大地提高它所能支配的生产力。其次,虽然苏俄能够在粮食和某些重要原料方面给它的盟国巨大帮助,它本身却还是需要像机器那样的资本货物,在今后很长时期内未必能够帮助它的盟国去进行它们都已经开始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美国不但能够大规模地向它的盟国提供粮食,而且还能够向它们输出资本和消费品,其规模之大,无疑防止了西欧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俄国人断言,西欧所获得的供复兴用的美援,是以使西欧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国际政策适应于一个其最后轮廓由美国政府决定的模式为代价的,即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下面这种说法却更加正确得多,那就是:俄国在中欧和东南欧的盟国不得不使它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都服从俄国的需要,以答谢俄国的比道义上的支援好不了多少的帮助。事实上,它们那些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所以能够维持权力,是因为知道有俄国给自己撑腰,虽然另一方面也出于本国人民的自由选择;而铁托元帅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与共产党情报局之间的关系则清楚地表明:俄国的任何一个盟国的政府如果不尽力去执行由它的克里姆林宫主子批准的政策,很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举动。

实际上,在几乎全世界范围内,这是一个不安定和混乱的时代。谁都不怀疑巨大的革命力量已经被释放出来,甚至都不可能猜测它们的精力什么时候会耗尽。同样也没有人怀疑,这些释放出来的力量已经造成一种恐惧和愤怒的心理,六年战争与其说削弱了还不如说增强了这种心理。没有一个政府不曾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去限制各种它认为对它所赞成的生活方式不利的思想的影响。美国政府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以阻止共产党渗入它的机关部门,同时还在它直接控制的部门外制造了一种反共气氛,因此,举例说,有些工会把它们的主要力量几乎全用来攻击共产党人,就和用来争取保护和提高会员的生活水平一样。反过来,苏联政府也几乎使它的人民和外界断绝了联系,禁止战时嫁给英国飞行员的苏联妇女去国外与丈夫团聚的命令,并不比苏联宣传家们不断强调苏联政府和人民不依靠盟国帮助而单独在这次战争中赢得了胜利更加骇人听闻。而且,镇压的风气并不只限于美苏两国;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使用镇压手段。在一些国家里,共产党人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危险的边缘;在另一些国家里,那些不喜欢共产党生活方式的公民,大有坐牢或甚至杀身之忧。

但是,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混乱还不止这些。俄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人不但一口咬定俄国是以民主方法治理的,而且还强调说它的各项制度代表着一种比那些不喜欢俄国生活方式的国家所实行的更高形式的民主。他们基本上都容易相信:无论在俄国或者在俄国的盟国,人民都一律享受着最充分的自由,而且还相信,那些因叛国或较轻罪名而受政府审讯的人是被按照客观的见解审判的,对这种见解表示怀疑是不公正的。他们觉得那些政府的习惯远比他们自己政府的习惯更直接地关连到人民的福利;他们解释

道,通常对那些政府的政策之所以完全缺乏有组织的反抗,并不是由于镇压或害怕,而是一种几乎普遍的满足的表现。如果请教他们,既然这种满足是真的,秘密警察为什么还要在那么大的规模上活动呢,他们就会振振有词地说,这些都不过是防止受外国煽动的密谋危险的安全措施。我本人就曾听见一位英国国教的牧师在莫斯科当众断言:俄国国教所享有的自由远远胜过英国国教所敢于想望的任何一种自由。对文学、音乐、戏剧和各有关艺术的控制导致对苏联文化界某些最负盛名人士的警告,说他们没有创作出符合共产党政治局标准的作品。关于遗传学的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李森科由于获得政治局的支持而战胜了他的批评者)之耸人听闻,不仅在于那些反对李森科的见解的人急忙放弃异议,坐视那些顽强反抗到底的遗传学家遭到清洗,对于改写遗传学教科书以删除书中对李森科反对的理论所作的辩护这一决定也唯唯诺诺;这场论战之值得注意还在于下述事实:当科学院一些著名的外国院士,如赫尔曼·马勒^①和亨利·戴尔^②爵士为了反对李森科把他的学说作为正统强加于人所使用的手段而退出科学院时,他们的辞呈竟被退回,因为这样一来,科学院就可以保留把他们从其队伍中清除出去的特权了。

鉴于苏俄的大一统极权统治结构,以及在其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对于密谋的几乎神经质的困扰,这种强使思想一致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它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强是可悲的。但是美国的心理氛围虽然远远不及俄国猛烈,在战后年代中却也同样动荡到

① 赫尔曼·马勒(1890—1967),美国遗传学家,曾获1946年诺贝尔奖金。——译者

② 亨利·戴尔(1875—),英国生理学家,曾获1936年诺贝尔奖金。——译者

了极点。把国会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行径当做非典型而撇开不谈是容易的。但事实是,它已经在美国的许多州里招致了同样的委员会。它导致了大批文职官员的清洗,其中许多人根本不知道造成自己被免职的罪名是什么。它在许多大学和诸如“电影”那样的行业中造成了很难不称之为政治迫害的事件。它使得表白共产主义见解成为许多人经济严重不稳定的原因,甚至使得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参加一些公开组织——例如亨利·华莱士先生要建立的第三党——成了一种危险的冒险行为,而且在私生活关系中也是一种危险的冒险行为。谁要是研究了联邦调查局“甄别”一位其正统信仰遭到怀疑的官员的方法,不禁会以为他已经对塔西佗^①关于提庇留^②及其继承人在位期间罗马特征的描写的重要意义有了真正深刻的理解。这种政治上的迫害行为引起了美国人本身的强烈愤怒,就和引起了密切注意其行动的外国人的愤怒一样,这种情况无疑是正常的;但难以解释的是这个事实:进行镇压活动的机关似乎能够不顾对它们的行为方式提出的一切抗议而继续存在下去,而且难得给予受害者以任何赔偿,即使尽人皆知它们没有丝毫理由对它们急于要消灭的那些人提出荒唐的指控。还有一件往往真实的事情是:许多臭名昭著的新闻记者把他们的精力用来对一些杰出的人士蓄意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不但明知这些攻击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知道越是毁坏这些人的名誉,就越能吸引众多的读者。戈培尔博士当年在纳粹德国使用的种种手法,现在几乎没有一种不是美国报纸一些最著名的闲话

① 塔西佗(约55—120),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编年史30卷等。——译者

② 提庇留(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暴君,在位期间加强军事独裁,严厉镇压人民。——译者

专栏撰稿人的惯伎。

说美国人向来爱表现,缄默从来不是美国报纸的特征,这当然是容易的。同样也可以很容易地坚持说,现在已几乎被公认为“诋毁战术”的东西,一直是1789年华盛顿将军就任联邦政府总统以来的政治战中的一件武器。甚至当杰斐逊被像提默锡·狄维盖特那样出名的人选举为总统时,都受到过这种待遇;而对安德鲁·杰克逊夫妇所发动的猛烈攻击,很可能促使杰克逊夫人早死。亚伯拉罕·林肯生前也同样遭受过种种下流的攻讦;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仇敌甚至在他死后也没有停止对他的恶意中伤。时常有人发议论说,没有理由认为“诋毁战术”的性质比从前更恶毒,或者其结果比从前更危险,并且叫我们记住法国的格兰瓜尔^①和沙尔·莫腊^②、英国的诺思克利夫^③和罗特米尔^④等人的所作所为,以了解美国人的谩骂风气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而只不过是一种像社会组织那样普遍的属类罢了。任何一个时期的报纸的历史都表明它难免要利用恐惧和仇恨作为武器,来达到那些控制着各种机关报的人所急欲达到的目的。如果报纸杂志仅仅限于用摆事实讲道理作为劝说的方法,那它们的销路恐怕会连生产成本也捞不回来。人们往往指出,即使宗教报纸也对那些攻击它的每一份机关报都撰文促进其利益的观点的人,表现刻骨的仇恨,其性质和非宗教的报纸没

① 格兰瓜尔,法国诗人和剧作家邦维勒(1823—1891)的一出喜剧中的人物。——译者

② 沙尔·莫腊(1868—1952),法国作家和批评家,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和德寇合作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死前不久即获释。——译者

③ 诺思克利夫(1865—1922),英国“报纸大王”,销路最大的《每日邮报》、《每日镜报》等报的创办人,在英国新闻界拥有左右舆论的能力。——译者

④ 罗特米尔(1868—1940),诺思克利夫之弟,为其兄管理财政,在其兄死后独霸新闻界。——译者

有什么不同。像潘恩和布莱德洛^①等非教徒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心理习惯。

我并不怀疑,单独来讲,否认报纸的标准有所降低是有着许多证据的;事实上,我应该更进一步说,除了在那些强使所有的报纸和其他一切通讯工具都刊登清一色的新闻和评论,发现谁拒不照办即严惩不贷的国家里,今天的报纸能决定意见趋向的可能性要比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小。今天的报纸鼓动恐惧和仇恨并利用“诋毁战术”之所以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它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种普遍不安全的气氛有关,在这部分世界里,一切旧的价值都受到挑战,一切旧的标准似乎都令人生疑,而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共同目标感也许比1848年以来的任何时候还要差。我们不但体验着一个革命时代的压力,而且还置身于一场国际性的内战,在这场战争中,人们纷纷加入斗争双方的一方,各民族国家的政府则设置尽可能坚固的壁垒来防止各种威胁它们生存的思想侵入。我们在1949年宽大为怀的能力远比在1899年为低,甚至恐怕比在1849年还要低。我们不再能把19世纪的大多数人民的愿望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不再确信以普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是一个正统的理想。我们不再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②曾经主张过的那样主张:“各民族的边界必须大体上与各国的边界相符。”我们不再对进步的必然性抱有一点信心。我们不再觉得能轻易地强调说,有些生活领域是无论哪一个政府都不能合法地进入的。我们已经失去了不少在为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斗争时

① 查利·布莱德洛(1833—1891),英国社会改革家和无神论者。——译者

②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译者

所有过热情。我们大多数人把实现白人和有色人(特别是如果有色人是黑人)种族平等的努力视为比19世纪种族平等论者认为可能有的复杂程度更加复杂得多。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是否要对科学家表示感谢(在1914年以前,对科学家表示感谢几乎是极普通的事),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大大有助于我们征服空间和疾病,洞察那么大的一个领域的奥秘,这个领域在过去是未知的,而且往往连探索的工具也没有。对于那些认为理性支配人的力量正在增强或在更大规模上发展教育就能解决一切重大问题的人,我们只有报之以苦笑。即使像“平等”、“博爱”那样伟大的字眼的身价也已经一落千丈,而自由的概念越过边界就会发生惊人的变化。

观察战后形势的人受到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想用修昔底德^①描写克基腊革命的著名的话来形容战后形势,这一点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形势无疑更为复杂,各种难题的规模也大得多,但却同样喜欢趋于极端,同样存在着几乎不能忍受的社会紧张,同样实行谩骂而简直无理可喻,同样恶毒地把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同样倾向于把批评者当敌人对待,同样怀疑任何一个躲在私生活圈子里的人是反社会者或逃避现实者——两者都是公众的威胁。但是,所有这些相似之处同希腊、罗马的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之间的根本差别相比,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坚称人有一种尊严,这种尊严使他不可能永远处于奴隶地位。我们已经公开否认下述说法,即社会结构的主要基础必须包括一些男男女女,他们履行而且能够被强制履行义务,这些义务不让他们具

^①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70—前400),古希腊杰出的史学家,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世界历史名著。——译者

有那些综合起来被我们称为文明生活的特质。一个确实很重要的情况是：尽管哲学家和重实际的人都力图利用一切人道条件来减轻奴隶所有制的普遍恐怖，古代世界却认为文明生活必须依靠奴隶是天经地义的。对奴隶制的合法性可能感到过不安，例如斯多噶派的法学家就是如此。到处偶尔会有一个像西塞罗^①那样的人真正迫切地想以仁慈和理解的心情对待他的奴隶。但那个世界的主要事实之一，却是把奴隶制当作文明组织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加以接受。残酷地镇压奴隶起义，就足以证明那个世界不能设想文明能与社会生活所据以组成的人的普遍自由这一前提并存不悖。

如果说，甚至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 1500 年内，我们已经成功地消灭了奴隶制，那当然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成就没那么大，但还是很重要，那就是：坚持奴隶制的重要原则无效，强调人的尊严是据以判断他有权享受的权利是否适当的标准。人们一贯努力——这种努力总是犹豫不决，难得彻底，从来不持续不断——想要给予自由平等各项原则以古代世界所不能想象的普遍地位。这种努力总是——往往是自觉地，但更多是不自觉地——被肤色或种族、宗教或民族、门第或财富这种或那种理由所否定。但是，特别自宗教改革以来，这种否定一般总是采取守势；它的鼓吹者越来越明白他们的态度是同那种也是越来越被承认为人类良心的东西相矛盾的。使人们日益广泛地看出这种矛盾的力量，就其基本表现来说，是经济上的；它们来源于人对自然的日益增强的力量以及人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人尽量充分利用那种日益增强的力量

① 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译者